

浙学的当下启示：性质、定位与特征

何俊（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学院教授）

浙学对于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启示，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先从浙学的性质讲。刚才许多同仁谈了对浙学的理解，这些理解有同有异，但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我都认同。我这个认同，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对浙学性质的基本理解，即浙学虽然具有她的基本历史事实，但同时更是一个建构起来的观念。由于是建构起来的观念，因此同样的历史事实就释放出解释的空间。浙学这个概念，顾名思义，形式上完全是一个以区域地理来指称学术思想的概念，但在最初的语境里，浙学并不指称两浙境内所有的学术思想。比如在朱熹那里，浙学主要专指永嘉永康之学；而像胡瑗在湖州的教育实践，则被宋代许多学者称作湖学；至于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又称婺学，等等。到了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尤其是章学诚讲浙东与浙西之学，似乎才对以地理命名学派有了更清晰的自觉意识，希望藉此来彰显某种思想史上的特殊意味。平实而论，以区域地理来概括区域内的所有学术思想，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事。在同一个历史时段，两浙地区的学术思想就有不同，加上浙江的行政区域的变化，以及学术思想在长时段的延异，学术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章学诚要标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不同，也充分佐证了这一点。因此，对于任何历史时段的学者来讲，如果在他的思想上具有明晰的作为区域地理学派的浙学观念，那么他应该是有自己的特定思想认同的，或者完全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无论取何种立场，都表明浙学的观念是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上的思想史建构。我着意讲明浙学的这一性质，目的当然不是要解构，甚至消解浙学。恰恰相反，我想表达的是，当我们今天来研究浙学，阐释浙学，希望由浙学中获得精神资源，从而实现文化强省的当下与未来愿景，我们也许可以从浙学的这一性质获得某种启示，即我们对浙学的认识如果希望取得新的成就，达到新的高度，既有赖于我们对作为历史事实的浙学的深细研究，又有赖于我们对当下浙江所呈现的时代诉求的亲切体会。只有将两者扭合在一起，才可能真正推进浙学的研究，也才可能真正推进文化强省的建设。

再是从浙学的定位讲。刚才讲到，用浙学来指称时，基本上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指称，都会有意与无意中把浙学引向，或狭义化为地方性的学术思想传统。这样的定位对不对？应不应该？唯唯否否。对不对的问题，考证于历史；应不应该的问题，取决于关怀。从历史事实看，当浙学最初被从外部给予标示时，标示的性质似乎要重于地方的性质；但是在后来被浙学中人自我标举时，地方性似也难以排除。尤其是，如果我们不把思想史狭义化为学术史，而放在近于文化史的理解上，历史中的浙学的展开与地方性特征是具有密切的关联度的。但是，在承认地方性的同时，又必须指出，如果把浙学完全定位在地方性的学术思想传统，那就既完全错了，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完全不应该的，不足以表达情怀。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段的浙学，还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段浙江区域中没有标名为浙学的学术思想流派，他们的学术思想从来不是自限于浙江的区域而展开的地方性表达。相反，几乎所有的浙江学者，无论他们是否标举浙学的旗帜，他们的学术思想总是置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视野中来展开的。著名的学者是如此，一般的学者也大抵如此。如果延及现代，浙江的学者不仅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视野中思考，而且是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中来思考的，比如章太炎、马一浮。他们的思想呈现方式与形态似乎给人很传统、很保守，其实认真去研究，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完全是现代的思想家，他们完全是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明的比较中来思考的。指出浙学定位上的这种内在张力，地方性的指称与超地方性的思考，对于今天的浙学研究，以及文化强省，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浙学的研究不能因为有个“浙”字，就把它弄成了纯地方性的研究；文化强省更不能自限于浙江的区域性来思考。历史中的浙学之所以具有她的超地方性的思想价值，正是因为她的思想定位是中国的，乃至更大的视野。当然，历史中的浙学之所以具有她的独特性，又是因为她的思想是植根于浙江的。因此，植根于浙江而成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这是极其重要，也是极为根本的定位。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中，浙学不仅要成为植根于浙江的中国思想，而且要致力于成为植根于中国的世界思想。唯此，才真正能为文化强省做出贡献。

最后想就浙学的特征讲。就我的研究心得，浙学无论是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还是现代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把握这些特征，对于理解与阐释浙学是重要的，对于今天的文化强省也是重要的。浙学的特征最显著的有三个：一是学源于

思。为什么浙江会出现王阳明的心学？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任何一个历史现象总是由许多的因素促成的，任何归约总不免陷于简化以至误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归约不仅有阐述的必要，而且也会促进认识的深化。如果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浙学的各个时段的各家论述中，学源于思几乎是共同的显著的思想诉求。王阳明的心学与浙学传统中的这一思想特征不是没有关系的。强调学源于思，表证了浙学具有高度的精神主体性。因为精神主体性的挺立，浙学才表现出思想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也因此在整个中国思想的表达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成为中国思想的重要部分。浙学的这种精神独立性不仅是呈现在思想的论说，而且是彰显在生命的实践。远的不讲，只就近看看章太炎与马一浮就清楚了。在新的体制已然确立并被主流追随的大时代里，章、马绝然自外于新的体制，这样的独立性是卓然的。

二是学成于史。浙学固然强调学源于思，重视学术思想的独立性与创新性表达，但是这样的思并不是空洞的、冥想的，而是基于丰厚的历史的。启于思而成于史，这是浙学的轨迹。学成于史，这个史既见于文献，又见于现实，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宋代浙学与清代浙学对历史的重视，大家熟知，我不举证了。我用王阳明来说明这点。阳明大致讲过这样一段话，前人创设种种制度，都是顺应人的需要，后人如果发现关于这些制度不符合自己的需要，甚至觉得这些制度有缺陷，那么或者是关于这些制度的记载有问题，或者是古今的变化已使得这些制度不适用了，因此对于制度的取舍应该尊重历史而顺应当下。这正是浙学的学成于史的思想特征。认识到这点，进而去理解浙学，我们才可能体会浙学所谓经史并重的传统，才可能体会浙学重视精神的主体性却又呈现出笃实的历史感。同样，今天的文化强省，也必须坚守学成于史的追求。只有将思想文化的思考置于包括了现实在内的活的历史中，思想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才足以引领实践。

三是学致于用。凡是在浙学的学术思想谱系中留下痕迹的，总是这些学术思想回应了当时的问题。充满强烈的问题意识，循着问题而产生深刻的思考，求证于丰富的历史，这是促成浙学学致于用的特征的内在逻辑。我之所以强调这个内在逻辑，是因为想表达，当我们在阐明浙学具有学致于用这一特征时，不要把浙学的这一特征误以为那种庸俗不堪的媚俗阿世。浙学的学致于用，是建立在浙学的问题意识上的结果。一种学术思想能不能够对现实产生作用，不是取决于思想者是否抱有用世的诉求，而是取决于思想者是否从真正的问题出发。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不只是知识上的艰难。从真正的问题出发，并且循着问题的追问展开学术研究与思想考辨，除了需要足够的知识素养与思想洞见外，还需要勇气。这种勇气，不仅是面对外在的权势与俗流，而且是面在内在的冥顽与固化。浙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能够产生她的影响，掀动现实的生活，那些思想者们无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叶适晚年的穷愁寂寞、王阳明的功愈高而谤愈炽……，后人眼里的浙学人物，他们的现实境遇远非他们的身后声名那么美好。唯有知此，秉承执守浙学的学致于用，才不会流于随口鼓噪，真正引导今天的文化强省能够勇立潮头，于无私无畏中实现。